

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与德国法西斯的兴起

吴友法

研究德国法西斯兴起的原因,是史学界最近几年比较注重研究的课题。德国法西斯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从不同角度写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诸多原因中,2、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因。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德国在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法西斯的变化,为法西斯活动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德国魏玛共和国遭受了1920年到1923年、1929年到1933年两次经济危机。希特勒就是利用这两次经济危机建立了纳粹党,并使纳粹运动得到发展以致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两次经济危机,也正是纳粹运动的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中,纳粹党员人数有3万人,纳粹运动迅速兴起。第二次高潮中,纳粹运动迅速发展,党员人数超过100万,在1932年7月议会选举中,纳粹党赢得1370万张选票,获230个议席,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在这两次高潮之间的1924年至1928年,正是德国在道威斯计划的扶助下,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且出现短暂繁荣的时期。纳粹党在这个时期曾多次被取缔,影响很小,而且党内分崩离析,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低潮时期。不难看出,法西斯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当时德国经济危机密切相关的。纳粹运动是在经济危机引起的魏玛共和国百孔千疮的肌体上滋生和繁殖起来的一颗恶性肿瘤。

2、30年代经济危机之所以促使了德国法西斯产生和迅速兴起,以致最后夺取政权,这是因为:

一、2、30年代经济危机为纳粹党提供了鼓吹民族社会主义反动理论、欺骗群众和煽动群众的良机。

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的产生并得以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需要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去吸引和争取群众。因此,任何一种政治运动总是与当时本国经济政治状况和人民群众思想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战后的德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1921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给德国造成一定影响,加之在战争中消耗大量财力和物力,国库告罄。同时,战败的德国要承担发动战争的罪责,又背上了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要付给战胜国巨额战争赔款。1923年,因拖欠赔款,法、比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重工业区,使德国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加剧了经济危机,生产大幅度下降,95%企业不能正常开工,工业生产只有1913年的20%,70%的工人部分或全部失业。

经济危机引起政局动荡,党派斗争激烈,政治上四分五裂。十一月革命由于不彻底,旧

政权的基础没有彻底摧毁，新建立的魏玛政权极不稳固，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由于接受了凡尔赛和约，加剧了经济危机，各种势力对德国现实普遍不满。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等所有支持旧帝国的人都攻击魏玛共和国。人民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普遍认为魏玛政权不仅没有给他们在经济上带来好处，而且在政治上使他们感到没有安定感，相反留恋旧帝国对他们在经济上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这样，在战后德国存在着一股反对魏玛共和国势力，存在着一股对共和国不满意情绪。

经济危机激发了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德国是一个有着民族主义传统的国家，从近代以来一直进行着为民族的统一而斗争。尤其是在战败接受凡尔赛和约，遭受战胜国的凌辱和宰割，民族感情受到巨大创伤之后，这种民族主义精神表现更加强烈。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经济危机是战胜国压迫的结果，是凡尔赛和约引起的。经济危机越激烈，民族主义情绪愈强烈。因此，战后德国人民中存在着反对和仇视战胜国心理，各种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纷纷成立。极右民族主义组织德意志协会的《德意志报》在和约签字的6月28日这一天头版写道：“复仇！德意志民族！今天，在凡尔赛宫镜厅签订了耻辱的和约。不要忘记这件事！”^①民族主义精神激荡着整个德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谁能迎合德国的民族心理，谁能煽起德国的民族精神，谁就能赢得群众。同时，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潮流也冲击着德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日益深入人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此，当时德国存在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潮流。

希特勒纳粹党就是适应这两股潮流而成立的。纳粹党成立后就打出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大肆鼓吹民族社会主义。何谓民族社会主义？希特勒解释说“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含有民族主义的意义的”^②，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民族国家”^③，把其宣扬的“社会主义”解释为“民族”和“社会”的合而为一，也就是一种集合体。他认为只有“准备以全副精力为民族谋利益”，“以民族利益为最高理想”的人，才能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者^④。这样，希特勒就以民族利益的保卫者的面目出现在德国人民的面前。“法西斯运动在整个德国主要是具有一种民族主义性质。”^⑤

打出民族社会主义旗帜，也是为了利用战后危机反对魏玛共和国。希特勒极力散布魏玛共和国出卖了民族利益，是德意志民族耻辱的象征。要使德意志民族振兴，就要推翻魏玛共和国。希特勒反对魏玛共和国主要抓住两点：一是认为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是根源于“十一月革命”，是背后中了卖国贼的暗箭，是那些参加“十一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犹太人造成的，也就是说魏玛共和国政府的那一帮人出卖的结果；二是魏玛共和国政府接受了“凡尔赛和约”，招致民族的耻辱。希特勒抓住了魏玛共和国这些“弱点”，进行反政府的民族主义宣传，是容易引起人们接受的。他给自己的说教涂上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其源盖出于此。

所谓“民族社会主义”，也是为了迎合德国人民在经济危机中对社会主义向往的心情，公开打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为争取民心采取的反革命策略。德国是马克思主义故乡，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一词在德国日益深入人心，各个阶层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设想出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由于战争和经济危机，造成了德国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在苏联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影响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把社会主义一词拿来，打出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可以起到鱼目混珠的作用。由于他把“民族社会主义”解释为“民族”和“社会”的集合体，而魏玛政府是不要民族的，这个政府是由“十一月罪人”组成的，这些人大部分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犹太人。这样，他就把马克思主义、“十一月革命”和魏玛共和国划等号，给人们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与魏玛共和国相等同的印象，极力泯灭人民群

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向往和追求，从而证明，只有纳粹党宣扬的民族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达到欺骗群众的目的。

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以后，通过道威斯计划的实施，依靠美国的贷款，使濒于崩溃的德国经济得以复苏，成为“整个世界经济史中最壮观的一次经济复兴”^⑥，人民生活也比较安定，所以纳粹运动在此期间影响不大。然而，德国经济繁荣是短暂的。早在1928年施特雷泽曼就预言：“我们是靠贷款过日子的。如果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要求偿还其短期贷款，那我们就要面临破产的危险。”^⑦1929年经济危机从美国爆发，迅速影响德国，使德国遭受的打击最严重，工业生产迅速下降，退回到19世纪末的水平。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失业人数高达八百万。德国曾一度有过的繁荣景象，转眼间烟飞灰灭。德国劳动人民生活又重新恶化，同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又不断加深。

这次经济危机为纳粹运动的迅速崛起和法西斯最后夺取政权提供了良机。希特勒利用经济危机造成的困境，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笼络和争取德国人民。他针对德国人民“社会地位出现下降”、“生计窘迫”而“在他们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希望能生活得更好一些的意识”，利用“他们总喜欢把自己失去生活上的保障归咎于民族的不幸”，希望“能把他们从悲惨境地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出路就是使帝国在‘国际大家庭’中享有公认的地位”的思想^⑧，有意识的进行宣传。

首先，希特勒集中火力大肆攻击魏玛共和国，极力散布这场危机是由于魏玛共和国“政府无能”，是他们接受凡尔赛和约的战争赔款以及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⑨，魏玛共和国是德国人民贫困和灾难的根源，“共和制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我们不能听命于一个骗人的国家，我们需要独裁”^⑩。其次，又大肆进行民族社会主义欺骗宣传。希特勒“是一个具有真正魔鬼般天才的群众心理专家”^⑪。他根据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心理和要求，“向所有人许诺：向失业者许诺提供面包，向农民许诺低廉的租金，允诺要抵御共产主义来保护有产者，答应给满怀民族自豪感的人一个新的强大的德国，向国防军答应要重整军备，向工业界答应高额利润和俯首听命的工会”^⑫。企图使德国人民相信，只有他才能把德国从多灾多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纳粹党宣传机关也大肆吹捧希特勒。1932年3月1日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散发的竞选号召书中宣称希特勒“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奋斗了12年，今天又代表人民对现行制度提出了挑战”，“希特勒对于千百万人民来说是拯救的同义语”，从“这个名字中看到新的生活和新的成功道路”^⑬。纳粹党还到处散发传单、小册子，张贴印有“德国猛省”、“希特勒就是独立、工作和面包”等字样的招贴画。这些宣传攻势不能不打动处在绝望之中的德国人民心理。不少中产阶级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对于下降为无产阶级的前景不寒而栗，不少职员和自由职业者从保守党纷纷转向纳粹党。“经营工商业的广大中产阶层、农民、特别是‘渴望英雄主义’的青年感到自己被共和国排斥，对希特勒的宣传愈来愈感到有吸引力”^⑭。纳粹党吹捧希特勒是“德国青年的强烈意志的体现”，“是所有追求德国美好未来的人们的一团烈火”^⑮。不少青年和大学生是听了希特勒演讲后被吸引到纳粹党的行列，如后来成为希特勒的亲信、得力干将的阿尔贝特·施佩尔就是如此。在听了希特勒演讲后，他说：“我丝毫不了解他的纲领，在我不及弄清真相之前，他已经把我掌握住了”^⑯。

正如德共机关报《红旗报》指出的：“经济危机给城乡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他们感到绝望，因而成了法西斯分子所进行的表面上颇为激进的‘反对资本主义’蛊惑煽动的牺牲品。”^⑰“Der Hitler, der Sorgt für uns!”（希特勒关心我们！）“这是集合在他旗帜下头脑简单的群众所普遍具有的感情。”^⑱在纳粹党通向夺取德国政权的道路上，被欺

骗的群众的盲目追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30年代经济危机导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危机，魏玛政府迫不得已逐渐改变统治方式，走上专制主义道路，为法西斯上台铺平了道路。

魏玛共和国是在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勉强建立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艾伯特在开始时是反对建立共和国的。只是由于对内为了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阻止以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斯巴达克派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对外迫于战胜国的压力，如果皇帝不退位，和平谈判不可能，如谢德曼所说：“11月9日（宣布皇帝退位日——作者注）是战争失败、无比贫困和憎恨战争贩子的必然结果”^①。在内外因素压力下，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才匆忙成立了多党派资产阶级议会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共和国成立时，他们主张的是在继续发展现存的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保留了旧社会的痕迹，担任政府部长职务的大多为旧帝国时期的官僚。所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封建的阶级关系、政治势力、意识形态基本上被保存了下来，议会民主制是很脆弱的。那些挂着民主共和头衔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是一些“没有信仰的陈腐的小资产阶级”^②。在社会上，存在着象“自由团”、“国家联合会”、“康苏尔团”等各式各样的反对共和国的反动组织。而且，在议会中也有不少反对共和国分子，如第一届议会中，敌视共和国的德意志民族党和德国人民党获63个席位。1925年，“君主主义者的偶像”、“德国皇帝的忠实奴仆”^③兴登堡被当选总统，再次说明当时德国反动势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反民主力量企图利用兴登堡从共和国内部去破坏议会民主制。当时有一种说法：魏玛国家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④。“反民主的势力明显地在起作用。”^⑤因此，共和国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孕育着导致议会民主制危机发生的因素。

这些反民主的反动势力的存在，决定了共和国的悲剧命运。30年代经济危机到来之前，敌视共和国的反动势力主要在社会上进行破坏活动，企图颠覆共和国。自从兴登堡当选总统后，他们企图利用议会民主制，从内部用合法选举方式来破坏议会民主制，恢复专制主义政体，从而导致了议会民主制危机的发生，以致为德国法西斯上台创造了条件。

促使这一转变是30年代经济危机。由于经济危机，使德国财政出现巨大赤字，失业人数剧增，工会要求政府保证失业救济金的数额，并试图把失业保险金从3.5%增加到4%。工业界拒绝增加保险金，相反认为减少失业救济金才是克服危机的途径。1930年3月，内阁各党派在讨论是提高税收还是减少社会支出问题上发生分歧，争吵不休，无法制定一项共同都能接受的财政政策，从而使魏玛联合内阁陷入困境，社会民主党人缪勒总理逼迫辞职。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指出：“内阁垮台的原因与所产生的可怕后果比起来简直无足轻重。在以后的数年内没有再能在议会的基础上组成政府。由于1930年3月27日大联合的破裂，德国议会自行解体了。”^⑥从此，德国进入了所谓“总统内阁”的领导体制。

“总统内阁”是在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确立的。魏玛宪法是德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但也有不民主的因素。比如，其中给予总统有特别的权力。第25条规定总统置于议会之上，有权解散议会和下令举行新的议会选举。第48条规定总统有权在“如果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严重的扰乱或威胁”的“非常状态”下，通过发布政令来制定“必要的措施，以恢复公共安全和秩序”^⑦，即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紧急条例”维持统治，尽管也规定议会可以否决这些“紧急条例”，但其权力是很有限的，因为总统也可以随时解散议会，有权宣布重新进行议会选举，而且有权将议会撇在一边，任命或罢免总

理。可见，总统是凌驾于议会之上的，有权取代议会，取代立法机构。“国家元首获得的实权比过去皇帝还要大”^②。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颁布的“紧急条例”，1930年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议会颁布的法令1930年98次，1931年34次，1932年只有3次；议会开会的次数1930年94次，1931年41次，1932年13次，议会政体的削弱，为专制政体抬头开了绿灯，为取消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独裁统治提供了法律依据。“总统内阁”的确立，实际上敲响了魏玛共和国的丧钟。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议会中反对共和国的势力越来越大，所占席位越来越多。反对共和国的有几股势力，主要是纳粹党和共产党。在1930年9月议会选举中，纳粹党议席从12个增加到107个，共产党议席从54个增加到77个；在1932年7月选举中，纳粹党议席从107个增加到230个，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共产党议席从77个增加到89个；在1932年11月选举中，纳粹党虽然丧失34个席位，但仍有196席，仍是议会中第一大党，共产党增加11个席位，占有100席。这两个政党的“联合行动能够废除”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令”，“也可以使任何法律无法通过”^③。这些反对党议员常常使用程序手段阻碍议会正常工作。因而，议会与政府是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议会不是作为监督、支持政府的一个机构，而是成为反政府势力的一块阵地。根据魏玛宪法，议会虽然仍按期开会，对政府政策进行表态，然而，议会如果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总统就解散议会。这就是为什么在缪勒政府垮台后，德国议会选举频繁举行，政府内阁象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原因之所在。

魏玛议会民主制危机的发生，也是由于党派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在经济危机中更加激烈。当时德国党派林立，有德国民主党、中央党、德国人民党、德国民族人民党、纳粹党，工人阶级政党有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些党派政治主张不尽一致，代表着不同阶级或同一阶级中不同集团、派别的利益。正因为如此，魏玛历届政府里没有一个稳固的多政党联合体制，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党能驾驶其他党派，控制政府，争取议会中多数。相反，党派之间斗争频繁，反政府党派占多数。频繁的党派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宁，人民群众对政党从心底感到厌倦。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政党一直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他们要求“结束这种议会党团的混乱局面”。《德意志汇报》当时断言：“人民深深渴望着领导和权威”^④。

由于经济危机无法缓解，人民群众的愤怒与反抗也无法平息。在议会内部，政府无法争取多数议员的支持，无法维持统治。在经过几届政府更迭后，兴登堡请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军队将军施莱歇尔组阁，从而出现了在德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军队将军担任总理的奇怪现象。然而，施莱歇尔没有争取到议会中的多数，不得不自动辞职，成为最短命的一届政府。“议会制度与民主制度日趋衰落，各政党都对此回天乏术，而且无法进行改革”^⑤。兴登堡在多种因素的促使下，不得不任命在议会中占比较多席位的纳粹党头目希特勒为总理。随后，纳粹党不择手段地控制了议会，实行一党专制。纳粹党终于利用议会民主制不健全的缺陷和困境，达到夺取政权以致最后推翻议会民主制的目的。用希特勒的话来说，纳粹党“参加议会机构”，只是为了从事捣毁它的活动”^⑥。戈培尔的话更是淋漓尽致地暴露了纳粹党这一反动策略。他说：“我们进入国家议会，是为了在这个民主武库中用它自己的武器来武装我们。我们作为议会议员，是为了在魏玛民主本身的支持下去瘫痪它”，“我们到那里去，就象是狼闯入了羊群”^⑦。

三、30年代经济危机促使了垄断资产阶级决心起用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通过对内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对外谋求发动侵略战争来摆脱危机、寻求出路。

纳粹党的崛起是由于广大中间阶层的追随。然而，希特勒的上台，则是依靠统治阶级的上层人士，与大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实现的。这一变化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因为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希特勒纳粹运动有一个认识过程，促使垄断资产阶级支持纳粹党、最后把希特勒扶上台是30年代经济危机。

纳粹党成立初期，虽然其党纲中有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条文，由于是打着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旗帜，其纲领中也有工人、小资产阶级群众能接受的条文。所以，垄断资产阶级对纳粹党的真面目在一开始没有认识清楚，对纳粹党没有予以积极的支持，1923年希特勒发动的啤酒店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从1929年经济危机开始后，希特勒决心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需要有权势人物的支持，从而主动加快了投靠垄断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步伐，频繁参加垄断资本家举行的秘密集会并发表演说，不断暴露了纳粹党的真面目。比如，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应邀出席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300个资本家参加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和盘托出了纳粹党的真实纲领。他大肆攻击民主制度，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叫嚷“我们有不可动摇的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连根铲除”^②。他还保证上台后建立一支800万人的军队，向垄断资本家提供空前庞大的军事订货，向外扩张，夺取新的“生存空间”。从这以后，垄断资产阶级才逐渐真正认清了纳粹党的本来面目，开始从经济、政治上积极支持纳粹党。1月27日这个日子在纳粹党的正式文件中被说成是“民社党历史中值得纪念的一天”^③。

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困境，垄断资产阶级决心起用希特勒纳粹党，通过建立法西斯政权来安定社会、维持统治。经济危机使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处境岌岌可危。在经济危机冲击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千百万失业者，依靠微薄工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的城乡劳动者，以及濒临破产的商人、中小企业主，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罢工斗争更是频繁发生。在这一斗争中，德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斗争前列，先后发表了《德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和《扶助农民纲领》，为维护劳动人民基本生存权利和民主自由而斗争。不仅如此，德国共产党还不断揭露法西斯的本质和欺骗宣传，号召人民起来抵制法西斯的进攻。以德共为首的德国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制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从外部严重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德国胜利，垄断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法西斯上台，用法西斯专政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平息“内乱”。希特勒主张在德国彻底铲除马克思主义，正好符合垄断资产阶级心愿。早在1931年10月，垄断资本家与法西斯组成“哈尔茨堡阵线”，在其决议中宣称：“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毒害，以法律权力从经济崩溃的漩流中拯救我们的政策”^④。在内部，如前所述，资产阶级党派斗争激烈，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势力乘共和国在经济危机中的困境，利用议会反对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度，使德国多政党的议会民主制发生了危机。因而促使德国统治阶级在统治方式上逐渐发生了变化，向专制主义方向发展。为了谋求政权统治的稳定性，改变议会与政府的对立状态，也需要寻找实行专制主义的代理人，挽救资本主义统治。他们认为，“希特勒党参加政府，建立一个真正的核心是很有必要的”^⑤，“纳粹党有不可争辩的权力参与政府”^⑥。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也需要利用法西斯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途径来摆脱经济困境。德国由于资源、市场狭窄，发生“空间危机”，原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被战胜国瓜分殆尽。外国

资本在德国经济困难时打入德国，侵入德国市场。德国经济在外国资本扶持下迅速恢复起来后，使其生产能力与缺乏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之间矛盾尖锐起来了。凡尔赛和约和战败国的地位又严重束缚了德国垄断资本向外扩张的手脚。对此，德国垄断巨头们是无法忍受的，希望争脱凡尔赛和约枷锁，谋求向外扩张，寻求新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分子早就谋求重整军备，对外进行战争。1927年，马克斯为了重整军备筹集经费，取消了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提高了房租以及面粉、肉类的税收，增加了工人劳动时间。1928年，缪勒内阁统治时期开始了建造装甲巡洋舰。1929年，德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公开叫嚷要战胜国归还德国的殖民地。1931年，布吕宁提出要把波兰走廊归还德国，法本托拉斯主席杜依斯堡主张建立在德国领导下的从“敖德萨直到波尔多”的经济联盟。他们还毫不掩饰地叫嚣“只有剑才是德国的经济政策”。这些都是为准备战争采取的重要步骤和舆论宣传。希特勒叫嚷要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正符合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因此，在政治、经济总危机中，垄断资产阶级就把赌注完全压在法西斯身上，企图通过法西斯专政来寻找新的出路。从布吕宁开始，德国总理都是由兴登堡总统任命的。既然垄断资产阶级支持希特勒，为什么在布吕宁下台后，兴登堡没有马上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而是出现了巴本和施莱歇尔两届政府呢？这是因为德国是一个党派林立的国家，他还想保持党派之间的团结，维护多政党制的体面。而希特勒呢？却不愿与其他政党合作，一心要独揽大权，实行纳粹独裁，兴登堡害怕这样会“使德国人民中的对立极其尖锐化”^⑩。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深，兴登堡再也无法寻找能争取议会多数的支持、结束议会与政府对立状态的总理人选，无法解决混乱的政治局面。希特勒又一心想当总理，并向兴登堡保证团结其他党派、争取议会多数的支持。同时，垄断资本家迫切需要把希特勒扶上台，并联名上书兴登堡，向总统施加压力，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在垄断资产阶级敦促下，兴登堡终于同意希特勒为总理，组织联合内阁。希特勒不是依靠本身的力量登上总理这个位置的，“只是通过‘传统的上层各集团和希特勒运动的领导层之间的一种联盟’这条弯路，他才执掌了政权的杠杆”^⑪。

希特勒为了利用经济危机夺取政权，极力讨好垄断资产阶级，得到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经济危机也促使了垄断资产阶级加深了对纳粹党的认识，需要利用纳粹党来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这就是经济危机在纳粹党和垄断资产阶级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导致希特勒法西斯夺取德国政权的结局。

注释：

①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译版，第532、597、601、643、642、478、554、623、666页。

②③ 希特勒：《我的奋斗》，香港现代出版公司版，第226、269页。

④ 康纳德·海登：《德国国社党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34页。

⑤⑬ 1930年6月15日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报》。

⑥ 苏娜·米勒等著：《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33)》，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128页。

⑦⑧ 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0页。

⑨ 约阿希姆·佩策尔特：《希特勒法西斯的煽惑活动》，柏林科学出版社1982年德文版，第135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慕尼黑Max Huebner出版社1985年德文版，第256、256、254、272、259页。

⑲⑳ 冯·瓦尔特·霍费尔编：《民族社会主义文件集(1933——1945)》，法兰克福1957年德文版，第24页。

㉑ 阿尔伯特·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三联书店1982年中译版，第16页。

㉒⑳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版，第314、340页。

㉓⑳⑳ 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著：《二十世纪欧洲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译版，第290、288、315页。

㉔⑳⑳ 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译版，第35、23、233页。

㉕ 鲁格、舒曼编：《德国历史文献(1929——1933)》，法兰克福1977年德文版，第57页。

㉖⑳⑳ 《德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59、158、159页。